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一卷

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1789—1850

[英] G·D·H·柯尔著

商务印书馆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一卷

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1789—1850年

〔英〕G·D·H·柯尔著

何 瑞 丰 译

俞 大 畏 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1
SOCIALIST THOUGHT
THE FORERUNNERS
1789—1850
BY G · D · H · COLE
LONDON, MACMILLAN, 1953.

内 部 发 行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 一 卷

〔英〕G · D · H · 柯尔著

何瑞丰译 俞大畏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851×1168 毫米 1/32 10²/4。印张 241 千字

1977 年 11 月第 1 版 197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2017·191 定价：0.9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系英国工党分子、费边社分子柯尔(Cole, George Douglas Howard, 1889—1959年)所著。全书近二百万字,分五卷出版。此次印行的是第一卷(1789—1850年)。

柯尔一向以“学者”自诩,除一度出任麦克唐纳时期工党政府的经济顾问外,大部分时间从事著述。著书很多,但并无专精,而是内容庞杂,涉及庸俗经济学、资产阶级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等方面。

柯尔此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一些历史情况和思想资料,对于我们了解那一百五十年内的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从芜杂的思想战场上披荆斩棘,去伪存真,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对于我们学习和总结国际上的思想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尚有可供参考之处。

柯尔同英国工党的其他右派人物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心怀仇恨,恐惧万分。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以抵制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为目的。柯尔妄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了,而只有靠什么投资管理和控制货币流通的办法来实现需求和生产之间的平衡,从而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实行所谓经济计划化,搞什么“福利国家”,借以维护英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柯尔在本书中就多次贬抑、诽谤、歪曲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阉割其革命精神,甚至用心恶毒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资产阶级思想家相提并论,把马克思主义仅仅

列为一家之言。柯尔声嘶力竭地鼓吹“社会主义”，其真意不在于实现社会主义，而在于以伪乱真，反对社会主义。列宁早在 1901 年就已经英明地指出：“……目前，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话深刻地揭开了英国费边社分子和当时在欧洲其他国家喧嚣一时的机会主义派别的画皮，暴露出其反动的真面目。

本书其余四卷是：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 年）；第三卷：第二国际（1889—1914 年）；第四卷：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1914—1931 年）；第五卷：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31—1939 年）。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77 年 1 月

目 录

IX

前 言	3
第 一 章 引言	7
第 二 章 法国大革命和格拉古·巴贝夫的密谋	17
第 三 章 葛德文、潘恩和查理·霍尔	28
第 四 章 圣西门	41
第 五 章 圣西门派	54
第 六 章 傅立叶和傅立叶主义	65
第 七 章 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	79
第 八 章 西斯蒙第	84
第 九 章 早期的欧文和欧文主义	90
第 十 章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105
第 十 一 章 欧文与工会——欧文主义的终结	122
第 十 二 章 约翰·弗兰西斯·布雷	133
第 十 三 章 人民宪章	141
第 十 四 章 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	159
第 十 五 章 路易·勃朗和劳动组织	169
第 十 六 章 毕舍和佩克欧尔	178
第 十 七 章 弗洛拉·特莉斯坦	184
第 十 八 章 拉梅耐	190
第 十 九 章 蒲鲁东	201
第 二 十 章 德国的社会主义——开端	219

第二十一章	布鲁诺·鲍威尔、赫斯和格律恩——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234
X 第二十二章	《共产党宣言》……………	248
第二十三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 年以前的 马克思主义……………	263
第二十四章	马志尼——1848 年的欧洲革命……………	281
第二十五章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290
第二十六章	总结……………	302
附：主要人物表	……………	317

前 言

v

本卷虽然独立成书，但在计划中却是一部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的第一卷。它所论述的年代大致是从 1789 年到十九世纪中叶。不过，即使就我自己所划定的范围而言，本卷也显然省略了某些属于这一时期的史实；其中最主要的是略而未谈俄国的社会主义——既没有谈到十九世纪二十年彼斯特尔的土地国有化计划，也没有谈到早在 1850 年以前就相当活跃的别林斯基、赫尔岑和巴枯宁等等。这是有意的省略，将在第二卷中补叙。我认为，推迟论述赫尔岑和巴枯宁会更便于把他们同以后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也就是把赫尔岑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联系起来讨论，把巴枯宁同分裂第一国际的斗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讨论。同这种省略恰恰相反，本卷关于许多思想家的叙述则又远远越过 1850 年的界限。关于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论述就是突出的例子。另一方面，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只谈到了他们早期的情况，至于他们后来的思想发展，则留待以后叙述他们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所发起或影响的那些运动时联系起来讨论。因此，本卷并不打算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就嘎然而中断，而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欧洲革命运动进入低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告解散时才结束的。

我愿向读者说明，这部著作并不是一部社会主义史，而仅仅是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史，只是为说明社会主义思想才提到必须一提及的实际运动。事实上，要一个人独立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史是不可能的事，那种著述的规模要比我想写的任何著作都宏

VI 大得多——即使我具备必要的学识，其规模也远非我想写的著作所能及。甚至就我目前在较小范围内所作的尝试来说，我对自己的不足之处也颇有自知之明。我完全不懂俄文，对西班牙文也几乎毫无所知，意大利文懂得很少，德文程度也不够高；而且我讨厌看德文书，只要有可能，总是避而不看。所以，前几种文字的著作凡是有英译本或法译本的，我都用译本，只有在我认为需要确定一段原著为德文的译文有无讹误时才去对照德文原著。此外，我在没有译本时间接利用第二手德文资料的情况也远比利用第二手英法文著作为多。我想素有修养的读者会很容易地看出这一点，虽然我希望自己还没有因此而迷误甚远。

本书第二卷初稿已经写完一半，其中除去补叙本卷略去的俄国先驱者以外，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期情况（直到十九世纪最后 25 年内各国社会民主党兴起时为止）；第一国际；巴黎公社；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不属于这两派的英国费边主义者和独立工党人等等之间的分歧；1850 年以后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在欧洲大陆的发展以及德国特有的通称为“学院社会主义”或“讲坛社会主义”的运动。我之所以要提一提这些内容，为的是有助于说明本卷为什么也同样略而不谈许多早在 1850 年以前就开始活跃的俄国以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德国的洛贝尔图斯、拉萨尔和冯·凯特勒，比利时的科林斯、卡茨和德·凯色尔，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某些先驱者等等。

本卷得以写成，应向许多人士致谢。首先应向我的同事艾赛亚·伯林致以最深切的谢忱，他曾看过本卷的全部校样，提出了令人敬佩的明智批评，帮助我作出重大的改进。我也感谢我的同事 H·G·申克博士和约翰·普拉梅纳茨提出的宝贵建议，他们阅读过本卷的若干篇章，帮助我改正了不少错误。我也深深感谢我的内兄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和我的朋友 H·L·比尔斯，他们曾惠借

我若干从别处难以获得的参考书；和往常一样，我的秘书罗莎门 VII 德·布罗德利的不懈帮助，使我深为感激，她竟能奇迹般地辨认我的字迹而又不以此见责。

我的妻子对我的帮助是经常一贯的，以致我往往坦然受之，绝口不言谢字。

G·D·H·柯尔

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1952 年 7 月

第一章

1

引言

人们往往强调,给社会主义下明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时常引以为憾。可是,无论在政治学或伦理学中,对任何重要的概念或制度从来都不能精确地下定义。关于民主、自由、德性、幸福、国家等名词,试问谁还能提出令人满意的定义呢?同样,难道又有谁能给个人主义提出一个比给社会主义更圆满的定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采取的可望获得成效的最上策,莫过于设法找出这类名词的某种核心意义,核心意义在这类名词的多种用法中几乎总是或多半伴有种种不同的附加意义,而从来不会在不含附加意义的情况下单独出现。找出这种核心意义,并不就能使我们了解这些名词;因为就名词所包含的意义而言,那些附加的意义也是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名词的意义只能是那些其言论值得尊重的人士使用这一名词时所要表达的意义;或者就实际情况来说,至少也是他们今天或以往使用这一名词时一般所要表达的意义。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找出核心意义,就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名词在各种用法下的涵义;而在寻找核心意义的过程中,找出一个名词最初用法乃是很有价值的第一步。

我们并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首先使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名词的。据目前所知,这两个词在1803年首次出现在意大利文的出版物中,可是当时的含义却同后来的毫不相干。往后就一直沒有再出现过,直到1827年欧文主义者的《合作杂志》才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来称呼欧文的合作学说的信徒。至

于“社会主义”一词，则是1832年在法文期刊《地球报》上初次出现的。这个刊物当时由比埃尔·勒鲁编辑，在他手上成了圣西门派的主要机关报；该刊就用这个词来表示圣西门学说的特征。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勒鲁和雷诺两人在他们的《新百科全书》和其他著作中随心所欲地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不久，这个词就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凡是旨在根据人权经济观和社会观来实现某种新社会制度的团体，都被称为社会主义团体。此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就流行于英法两国，而且很快就传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时也传到美国。这两个词多半是先口头上使用，然后才见诸文字。根据已知的各种最早用法来看，它们并不象是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新词，虽然也有这种可能。用这两个词来称呼某些改组社会的意见和计划是相当方便，也是十分自然的；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日常用语中已经需要一种大体上切合的词来称呼这类改组社会的意见和计划了。

一般说来，使用这些名词的人企图借它们来表达的意义是不难看出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都是由“社会的”这一形容词衍生出来的，前者指一般认为称得上“社会的”学说，后者指倡导这种学说的人。这里用“社会的”一词，其含义和“个人的”相对。“社会主义者”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反对当时流行的强调个人权利的见解，着重注意人类关系中的社会因素，并力图使社会问题在由于法国大革命和随之产生的经济革命而引起的人权大辩论中受到注意。在“社会主义”一词用开以前，人们已经谈到过“社会制度”这一含义大致相同的术语。“社会主义者”一词指的就是在许多种“社会制度”中拥护其中一种的人。这些“社会制度”在内容上虽然彼此有出入，但都一致反对经济学中流行的个人主义制度，一致反对当时一般人在人类关系和如何正确安排公众事务的看法和态度上把政治问题列在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前面的见解。

原先象这样冠以“社会主义者”称号的流派主要有三个，不过还有许多较小的流派也代表着大致相似的倾向。这三派是：法国³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以及在1841年正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的欧文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三人虽然在许多方面各有不同，但实质上走的都是社会化道路。至少就以下三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上说来是如此：首先，他们都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坚持所有善良的人的头等重大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增进大众的幸福和福利。其次，他们都认为任何以人们争夺生活资料为基础或者是鼓励这种争夺的社会制度如果继续存在，那就同上述任务完全不能相容。第三，他们都极不信任“政治”和政治家，并且相信未来的社会事务的控制权主要应该由“生产者”来掌握，而不应由议会或部长来掌握。他们还认为：如果人类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能够妥善地组织起来，各种传统的政府机构和政治组织就会很快消失，一个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新世界就会代替充满王室倾轧和帝国冲突的旧世界。当然，十九世纪早期还有许多严格说来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如维克多·雨果）也同样有这种不信任“政治”，而认为“政治”制度注定很快会被一种更好的新的人事安排所代替的思想。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年代，在如何对待人类的各种问题上，思想界基本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从“政治”出发，另一种则是从“社会”出发。

可是除了这些共同的观点以外，仍然有很大的分歧存在。傅立叶派和欧文派都是热衷于建立公社的人。他们都计划在真正社会化的基础上在全世界建立地方公社网来代替旧社会，并且相信建立这种新的基本组织不必通过暴力或革命，单凭它们在增进人类福利方面所具有的显著优越性就能取代现存的社会结构。而另一方面，圣西门派则深信大规模组织和科学规划的功效；他们一⁴

心想把民族国家改造成巨大的生产协作社，由具有科学知识和卓越技术才能的人来管理，并且想用以全世界为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总发展计划把这些经过改造的国家联系起来。就政治活动这一名词的一般意义来说，欧文派和傅立叶派大都回避这种活动；而圣西门派则有志于掌握国家和政府，并一心想改造它们，使之适应自己的新目标。

此外，傅立叶的信徒主要考虑的是土地的集约耕作而把工商业贬低到次要的地位；欧文派则非常了解产业革命的重要意义，想建立一个以工农业的均衡生产为基础的新社会；圣西门派主要注意的则是大工程事业（例如开凿运河、兴修水利、建筑铁路和公路等）以及为大规模经济规划服务的工具——银行和金融组织。

以上是三派的重大分歧，但是三派学说中的共同因素仍足以使他们在一般的提法中赢得一个共同的名称。他们都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经济制度，也都坚决反对自然经济规律论——这种理论认为，只要政治家能够维护住财产权，同时又放手不管经济事务，则经济的自然规律就能造福大众。他们全都反对放任主义，认为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需要一种积极的集体组织以增进福利，并且主张这种组织应该或多或少是以合作的而非竞争的原则为基础的。1839年，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在他的创始性著作《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中，把他们全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此后，这个称号一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采用，便永远同他们联在一起了。

由此可见，最初使用“社会主义”这一名词，指的是以合作为基础、以大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的人类事务的集体管理制，所强5调的不在于“政治”，而在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于加强对公民的毕生教育中的“社会化”影响——教育他们在行为、社会态度和信仰方面遵守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方式。因而，一切“社会主义者”对

教育都莫不深为关怀，并且认为享受良好的社会教育是一种基本“人权”。

不难看出，在以上关于早期“社会主义”学说的共同特点的叙述中，我们只字未提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同资本家(雇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里之所以没有谈到这些概念，其原因在于：虽然这些概念在巴贝夫运动中不用说显得很突出，而且很快又在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社会斗争中再度流行，可是除了在十分偶然的场合下，这些概念在上述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简直没有什么地位。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或罗伯特·欧文，都根本没有想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作为两个在经济上对抗的阶级的阶级斗争，更没有想到实现他们的计划要牵涉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规模斗争。他们全都同意，就实际情况来说，工人是受剥削的牺牲者；他们全都挺身维护圣西门所说的那个“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的要求；他们也全都抨击财产和收入的过分不平等现象，要求节制财产权。但是，他们认为财产私有制的弊害是由于“游惰者”——这又是圣西门的用语——的蛮横要求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工人受到直接雇主的剥削所造成的。他们认为，工人受剥削主要是寡头政治特权制度的一种次要后果。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忘记，当时“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在所有国家主要还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圣西门希望“实业家”——既包括雇主也包括工人——在反对旧特权阶级和维护其权力的旧国家的斗争中携起手来。圣西门希望人们要严格根据他们的实际贡献获得报酬——根据这种理论，圣西门的信徒从逻辑上得出了遗产继承权应该取消的结论。圣西门完全准备让“大实业家”凭他们对公众作出的重大贡献去获得巨额收入。傅立叶想把出资者和经理人员的报酬份额限制在总产值的一定比例上，实际上也希望对财产收益课征高额累进税；但是，他并不主张取消财产权或者强行把收入拉平。欧文

想使资本只能得到一份固定的或不超过一定限额的股息，剩余的利润则应全部用来发展有利于大众福利的社会事业。他也相信，随着新社会制度的日益发展，想比别人更富有的欲望将会逐渐消失，资本所有者将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所得。欧文、傅立叶同圣西门一样，都没有想到他们的计划是唤起劳动阶级同雇主阶级进行大规模斗争的号召。

就是这样，傅立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徒然坐待资本家响应他的鼓吹自愿地对他所倡导的公社提供资金；而欧文则把他本人和朋友的钱财投入他的“合作村”，并且不断地寻找能够理解其理想的美妙之处的富翁。圣西门也梦想得到富翁们的支援，而他的后继者有时也确曾找到过这样的人。事实上，圣西门最有名的信徒安凡丹就当上了铁路经理，另一些圣西门主义者，例如贝列拉兄弟等人，后来在金融界中也都起了领导作用。社会主义在早期——按照当时对这一名词的理解——显然不是劳资之间阶级斗争的学说。

可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不仅早在“社会主义者”一词使用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本身就包含许多学派和各种不同的见解，而这些学派和见解在当时都被认为同“社会主义”的学派和见解是有区别的。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阶级斗争学说的主要鼓吹者是激进主义的极左派，他们从格拉古·巴贝夫和1796年的平等派密谋得到启发。“巴贝夫主义”和“巴贝夫主义者”当时在法国是常用的词汇，1830年革命以后尤其如此。而“无产阶级”一词则更加同巴贝夫主义的传统有关。巴贝夫的信徒们同欧文派、傅立叶派以及圣西门派完全一样，也特别重视“社会问题”；有时，人们也把他們和上述三派混同起来，统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这只是1830年以后70后很久的事情。在这以前，更常见的情况是把他們和上述三派区别开来，因为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都是有组织和得到认可的团体，正